

史時期，地方社會上各種人群的情況及其相互關係，另一方面也在探討不同時期的社會變遷所反映出來的社會機制與影響。不過，由於是薈萃成書的論文集，所以各篇論文的具體關注點還是有很大差異的，難以體現一個更加整體的南嶺歷史地理的研究脈絡，而書後的綜述及圓桌討論紀要可以說是一個有意義的補充。本書既然是「第一輯」，那顯然還會有後續著作問世，從而更進一步推進南嶺的歷史地理研究。

任建敏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佐藤量，《戰後日中關係と同窗會》，東京：彩流社，2016年，225頁。**

本書以在關東州租借地時期畢業於大連日本人學校的日本人和中國人所組織之同窗會（亦即校友會）為切入點，利用當事人的口述紀錄、書信，以及各種同窗會通訊等資料，分析中、日民間交流，還有他們敘述自己經驗和記憶的方式。在書中前半部份焦點為旅順工科大学校友的動向，而後半部份則以各種小、中學校校友的動向為分析題材。

第一章〈日本人學校の中國人エリートたち，1930-1940年代〉（日本人學校的中國人精英，1930-1940年代）在簡單整理了關東州的學校制度基礎上，着眼於殖民地學校體制最高學府的旅順工科大学，追蹤中國畢業生的動向。筆者提出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即對當時的中國人來說，在交戰國的學校上課象徵着什麼意涵？而他們的戰略又何在呢？

第二章〈日本人の引揚げと中國人同窗生〉（日本人的遣返和中國人校友）先是概觀了敗戰後日本人遣返的國際政治環境，以及中國的相關政策，之後將視線轉移到大連，介紹當地日本人的遣返和留用，還有為留用日籍人員子弟所開設的日僑學校之情況。至於這些學校的中國畢業生，也處於極為微妙的立場，很容易被視為「漢奸」而受到政治處分。有關這一點，本書以一位旅順工科大学畢業生為例，進行介紹。

第三章〈日中民間交流と同窗會ネットワーク，1950-1960年代〉（中日民間交流與同窗會網絡，1950-1960年代）探討了在中、日兩國外交斷絕期間，透過旅順工科大学同窗會進行的民間交流活動，對中、日關係所發揮的

作用和功能。作者特別留意到相田秀方和張有萱兩人，詳細地分析了他們立場和意向上的差異，乃至雙方造成的具體作用。

第四章〈日中國交回復，1970年-1980年代〉（中日邦交的恢復，1970年-1980年代）分析中日邦交正常化時期同窗會的作用。這段時期的中日交流，尤其是經濟方面特別突出。不過，筆者指稱中日之間對大連的記憶與敘述，已有顯著地差異。日本人在講述大連時的特點，着重於懷念或喪失感等各種情感之表達；與此相反，中國人的講述基本上則與戰後中國的「大敘事」一致，以發自現實主義的內容為其特點。

第五章〈植民地經驗の記憶と忘卻，1980-2000年代〉（植民地經驗的記憶和遺忘，1980-2000年代）從《大連街巷地圖》（たうんまっぶ大連）的製作過程，來看集體記憶與個人記憶之間的關係，其中包括了日本人校友和中國校友之間的合作，乃至兩方面在記憶上的落差等。《大連街巷地圖》不僅積累了各種類型的同窗會記憶，並且形成了個人經驗的集體記憶。但作者提醒我們：《大連街巷地圖》畢竟只有日本人共享的記憶，其他人們的記憶卻很容易因而被遺忘。

本書是第一本分析殖民租借地統治下日本人學校的同窗會及其網絡之專著。書中涉及許多重要論點，主要貢獻可概括為如下三點：

第一點，本書除了利用日本人校友的憶述和經驗之外，也盡可能追蹤中國校友，從不同角度分析有關大連的記憶。近年來，關於滿洲記憶的研究雖有一定程度上的累積，但大部份討論都偏重於日本人的記憶。這固然與出版回憶錄、遣返日人團體的存在等因素密不可分，是無法否認的事實。本書有意識地突破過去研究的限制，蒐羅被統治者的憶述，應是最大的貢獻所在。而被統治者的群體，不僅包含中國人（漢人）校友，也像本書第187至192頁所說的那樣，還包括朝鮮人校友的講述。經由收集這些不同群體的講述，更能體察記憶本身的多樣性，具有重要的意義。

第二點是本書採用的時間幅度及其有效性。本書分析的時段長達70年之久（從1930年代到2000年代），在同類學術著作中是十分罕見的。中日校友雙方的講述和記憶，絕大部份被他們的環境、世代差距及時代變遷所影響，往往只有採取較長時段的分析，才能看出這些問題。將這一「經線」和中日比較這一「緯線」結合在一起，更加提高了本書結構上的有效性。作者分別描寫了中日校友之間對大連不同的印象。日本人校友的大連形象隨着時間的推展而收斂成為私人講述；與此相反，中國校友的大連形象卻始終離不開「國家發展」的面向（或者說是「不得不」而有這樣的講述）。

第三點是史料的多樣性。近現代中日關係史的主要史料為各級檔案。然而，如同像本書一樣，若將探討對象設定為民間，就還需要進行各種口述調查，以及進行收集書信、日記、筆記等個人紀錄。作者長期以來耐心地累積了不少相關的個人紀錄，大大地提高了本書的說服力。儘管本書是文化人類學者的著作，但對歷史學者而言，在史料的運作上肯定有不少借鑑之處。

誠如上述，本書有清晰主旨和論述方式，對相關領域的發展做出不少貢獻。然而，因為本書篇幅只有225頁的緣故，在筆者看來，仍有不少論點尚未充份展開。以下根據筆者個人調查經驗中，提出四點建議。

首先是圍繞「鄉愁」記憶所具有的兩面性。第四章分析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後日本校友的大連記憶，並指出其特點在於將「懷念」和「喪失感」混在一起。作者也支持坂部晶子相關的看法；不過，若是全面利用其他資料，似乎可以進行更進一步的深化討論。譬如，我們閱讀1970年代大連訪問團編輯的《私たちの訪中記》（我們的訪問中國記），可以發現其實訪問團對大連的印象上，無疑也有極大的分歧：有些人在書裡表現出重訪「故鄉」的感激，而有些人則是看到社會主義體制下大連的喪失感，亦即眼前的大連已非他們記憶中的故鄉。（松下恆郎、寺村謙一，《私たちの訪中記：30年ぶりのふるさと大連》，東久留米：耀連會，1977。筆者利用這個資料討論過遣返日人的鄉愁問題，參見佐藤仁史、湯川真樹江、菅野智博，〈關於滿洲遣返日人團體的會報及其史料價值〉，《暨南史學》，第17號，2014年，頁139-164。關於這個訪問團的詳細情況，參見寺村謙一，《再訪大連》，名古屋：一の丸出版，1978）後者之中也有後來不願跟中國或者遣返團體往來的人；但需要注意的是，也有一部份人是透過收集當時各種資料，來「復原」他們心目中的故鄉（作為這種活動的例子，可以舉 *The Great Connection* 等20世紀大連會議的一系列出版品）。

第二點是關於世代的問題。例如，在第129頁提到大連會（「大大連會」）的例子，作者討論戰敗前已有工作經歷的第一代，和當時只是中小學生第二代之間的差別。筆者基本上同意這樣的時代區分，不過認為世代問題還有另外一項指標，也就是從年幼時期到青年時期住在「內地」（指現在的日本四島）還是「外地」，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因為這段時期的經驗會強烈地影響到「鄉愁」的內容和方式。

第三點是怎樣理解校友網絡這一問題。第三章以兩位旅順工科學校的校友為中心，追蹤戰後沒有正式邦交時期的中日民間交流。作者強調同窗生網絡「這一堅固的人際關係」成為中日民間交流的基礎，但筆者認為值得商

權。因為我們應該多注意到：中國的「民間」和日本的民間並非對稱的，前者始終離不開屬於國家動員的一面。如果不把結論歸納為「堅固的人際關係」，而對網絡的實際運作情況等多加着墨，則本書的論述將會更加豐富多彩。

第四點是有關史料的操作方式。本書既以大連為例，主要分析對象自然而然就設定為城市居民。但本書提到的主要是城市內中上層人士的情況，而中下層人士——工商業者的情況，依然還有許多研究的餘地。譬如，上述提到「20世紀大連會議」的秦源治先生，其父在大連連鎖街經營了一家名叫「丁字屋」的服裝店（〈丁字屋洋服店店主——秦助市〉，載東京電報通信社編，《戰時體制下に於ける事業及び人物》，東京：東京電報通信社，1941，該文收入秦源治編，《大連連鎖商店街ものがたり》，大分：20世紀大連會議，2008；大野絢也訪問，尹國花、菅野智博記錄，〈一位少年的大連記憶：秦源治先生訪問記錄〉，將收入《口述歷史》，第14期）。便是類似的群體。我們有必要透過更多、更廣泛的事例來進行更深化之討論。除此之外，在歷史學者看來，本書雖然採用了較長的時間幅度，卻帶來了各個時期的實證性的不足。例如，在第二章分析從戰敗到遣返期間日本人的生活，雖非為大連的史料，但筆者收集到《八木日記（長春日僑生活抄）》和《通化日記》等日記等史料（八木聞一，《長春日僑生活日誌抄（八木日記）》，收於滋賀大學經濟經營研究所藏《滿洲引揚史料》中；渡邊通業，《通化日記》（稿本），由大同學院二世會捐給「滿洲記憶」研究會），或許可以相互印證。

因為篇幅的關係，有一些論點無法進一步提及。筆者衷心希望，今後以本書為開端，可以使「滿洲國」的記憶和講述等研究，有更多之進展。

佐藤仁史  
一橋大學社會學部